

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和实现路径

郭冠清^{1,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首先, 文本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唯物史观、科学思想方法三个层面, 探索了经济安全治理体系演变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 以开放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托, 对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生成的理论逻辑进行研究, 对为什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什么要提高自主生产能力、为什么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行分析; 再次, 以经济思想史为视角, 对经济安全治理理念标识性概念从统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再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最后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演化进行梳理; 最后, 从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提高国内外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等方面, 对如何增强经济安全性的主动权, 推动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分析。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科学思想方法; 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 科技自立自强; 增强发展安全性的主动权

中图分类号: D6331;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4) 05-0077-14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设立专章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充分彰显了国家安全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等诸多方面, 由于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最高表现, 其他安全无一不包含经济因素, 因而经济安全居于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加速演变的背景下, 增强经济发展安全性的主动权, 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头等大事。

与安全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自2001年1月1日-2022年3月15日, 国内核心期刊刊载相关文章高达19865篇^①, 已有文献大多是对中央有关文件的阐释, 包括对其内涵、宗旨、重要意义、实践路径等的阐述。有少量文献展开学理性探索, 例如, 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②③}、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进行研究^④、从历

收稿日期: 2023-06-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项目“国有资产监督有效性研究”(GJK2022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21JJD710005)、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优势学科建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① 詹承豫、高叶、徐明婧:《系统韧性: 一个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概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
- ② 政武经:《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思考》,《人民论坛》, 2020年第33期。
- ③ 王延欣:《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22年第2期。
- ④ 朱巧玲、杨剑刚:《新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史逻辑进行梳理^①。也有文献深层次拓宽了安全性核心概念^②，但因所研究问题较为复杂，迄今为止，缺少具有系统化学理化的研究文献。

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以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的科学思想方法三个层面，探索经济安全治理形成的方法论；进而以方法论为基础，构建一个开放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分析市场经济的内生缺陷、经济全球化内在不稳定性、后工业化时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失灵，为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经济自主能力和内生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结合新中国经济史，对经济安全治理理念标识性概念从统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从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演化进行梳理；从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and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科学水平、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提高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等方面，对如何增强经济安全性的主动权，推动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分析。

一、构建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和实践

认识论为一体的科学思想方法^③，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为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④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际，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内涵。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位居“六个必须坚持”之首，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

① 韩立群：《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生成逻辑》，《前线》，2022年第6期。

② 詹承豫、高叶、徐明婧：《系统韧性：一个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概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③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中，将“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列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161-170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首次提出“科学思想方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①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方略中的第十个方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②。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核心位置，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③

（二）遵循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

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④由此可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中介变量即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和变革的基础，但不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也不是其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滞后变量而不是相反^⑤。“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都由一国特定的经济发展任务派生，并随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安全治理体系这一中观层面的生产方式而言^⑥，同样面临生产力的约束条件，遵循“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遵循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根据生产力发展阶段，选择适合它的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安全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安全治理体系演变的关键：为什么我国的安全治理体系从“一边倒”^⑦转向“正确处理国防和建设关系”，为什么改革开放后转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什么要把安全当作头等大事，进而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需要说明

①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4页。

⑤ 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⑥ 笔者将生产方式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⑦ 黄志钢、郭冠清：《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并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①。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②其中,“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中,例如,列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等在不同时期提出“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论述。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的权力机关,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与运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强大建设功能的主体,这些作用的发挥建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要充分理解国家的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③

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本质是统筹经济与政治。首先,政治起统率大局的作用,统率发展和安全的大局。其次,发展是经济问题,安全不仅包括经济安全,而且包括诸多超出经济层面的安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安全共同为经济发展提供前提条件,要使诸多领域的安全得到落实,需要对其进行统筹协调,分进合击,只有充分发挥政治的引领作用,才能使诸多领域的安全保障共同发挥作用。再次,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方面,经济安全是基础,政治安全是首要的^④,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安全。经济是基础,政治高于经济,在发展和安全中,发展是基础,安全的经济发展高于单纯的经济安全,经济发展要在安全的国内外大环境中才能实现,反之,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体现了经济是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把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⑤,符合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既体现在统筹经济与政治层面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体现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层面,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保证安全成为发展的前提,发展成为安全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经济与政治间优势互补并相互转化,由此,统筹发展和安全能使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两方面优势互补,实现发展优势和安全的优势互补。在经济与政治中,政治发挥引领作用,核心在于把握政治引领的主动权,即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工作,中心在于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发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凸显了文化的作用。

③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展和安全，如果失去主动权，各项工作将陷于被动，无法保障发展和安全。

（四）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的根本方法。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实践认识论应用于经济工作中，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方法。

1. 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作出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战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①。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之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

系统观念是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思想方法。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错综复杂，需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2.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中国具体实际即现实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即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

题。”^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③

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如果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那么，定会构建出与“中国情境”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④，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⑤

3.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的工作方法，是实践认识论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稳”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调和全局，只有把握这一前提，才能守住资源、环境和生态底线，守住民生底线，守住防范系统风险的底线，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在“稳”的基础上，要在关键领域“进”，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把握的原则和方法。要根据我国实际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稳中求进调整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二、构建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

如果唯物史观为分析经济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那么，剩余价值学说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剥削性质的同时，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

①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 关于“中国情境”，参见黄群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情境、历程、经验与使命》，《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济的运行规律。与经济安全直接相联系的理论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由于对外贸易在马克思时代的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小,马克思忽略对外贸易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所占比重较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要将对外贸易纳入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构建开放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

(一) 开放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

1. 社会总产品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①的实现及补偿问题。社会总产品补偿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价值补偿指社会总产品售罄,由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以补偿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获得新创造的价值。实物补偿指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各部分由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后,购买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而实现实物补偿。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c)和新增价值(m)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的经济用途产品组成。参照马克思的分类,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I)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资料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第二部类(II)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即用于消费资料的各种产品的生产。

2. 开放条件下的简单再生产理论

在开放条件下,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可以分别表示为:

$$W_1 = c_1 + v_1 + m_1 + nx_1 \quad (1-1)$$

$$W_2 = c_2 + v_2 + m_2 + nx_2 \quad (1-2)$$

公式中 nx_1 、 nx_2 分别表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净进口产品价值。

在开放条件下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第一部类可变资本、新增价值加净进口产品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即:

$$v_1 + m_1 + nx_1 = c_2 \quad (1-3)$$

简单再生产的派生条件1:第一部类生产资料价值加生产资料净进口产品价值等于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即:

$$W_1 = c_1 + c_2 \quad (1-4)$$

简单再生产的派生条件2: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价值加消费资料净进口产品价值等于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即:

$$W_2 = v_1 + m_1 + v_2 + m_2 \quad (1-5)$$

在开放条件下,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条件将会出现较大的灵活性,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可以通过进出口实现平衡,但这取决于国际市场能否随时供应和消化本国的产品。

3. 开放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在开放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条件的社会产品实现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为:

$$v_1 + \Delta v_1 + (1 - a_1)m_1 + nx_1 = c_2 + \Delta c_2 \quad (1-6)$$

即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本部类投资者用于个人消费的价值之和加第一部类的净进口产品价值,必须等于第二部类原有不变资本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总和,这是扩大再生产条件的社会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

在开放条件下,社会产品实现的第二个基本条件为:

$$c_1 + v_1 + m_1 + nx_1 = c_1 + \Delta c_1 + c_2 + \Delta c_2 \quad (1-7)$$

即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加生产资料净进口产品价值,等于两部类原有的不变价值和追加的不变价值之和。

在开放条件下,社会产品实现的第三个基本条件为:

$$c_2 + v_2 + m_2 + nx_2 = v_1 + \Delta v_1 + (1 - a_1)m_1 + v_2 + \Delta v_2 + (1 - a_2)m_2 \quad (1-8)$$

即第二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之和加第二部类净进口产品价值,等于两部类原有的可变价值、追加的可变价值以及投资者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

因此,在开放条件下,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三个产品实现条件,分别是(1-6)(1-7)(1-8)。

在开放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实现条件如同简单再生产将会出现较大的灵活性,国内不足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可以通过国际市场生产,国内过剩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可以通过国际市场销售,但这取决于国际市场的状况。

(二) 市场经济具有内生缺陷,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无论封闭还是开放,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

^① 社会总产品指社会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由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既包括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又包括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

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个产品实现条件（1-6）（1-7）（1-8）难以得到满足，自发的市场经济要达到均衡状态较为困难，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①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使用数例法而不是现代经济方法，且建立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假设的前提下，但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足以说明市场经济存在内生缺陷。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克服市场经济的内生缺陷提供了可行方案^②。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仅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克服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能够解决市场经济微观有效率但宏观无效率的问题。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同时，带来在自发市场经济中可能并不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长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过度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偏离最优配置、粮食收储政策引发的诸多问题等，尤其是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过剩、生产扭曲问题，上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三）经济全球化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需要提高自主生产能力

经济全球化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可能过高，致使一国经济过多依赖国际经济，即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个产品实现条件（1-6）（1-7）（1-8）过多依赖进出口，带来经济安全的风险，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传统按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全球配置资源成为一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但也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的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安全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经济自

主能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生产力状况的战略选择。

（四）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在后工业化时期失灵，需要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如何才能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1893年，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提出再生产图式方案^③。列宁关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参数调整、静态动态相结合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份额不可避免下降的状况，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性，而且提出对社会主义实践影响深远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再生产图式包含极其深刻的道理，即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可以按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则，通过有计划地按比例生产，不仅可以解决自发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而且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苏联于193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化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初步完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化搭建，皆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应用取得的丰硕成果。虽然计划经济克服了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快发展，但由于缺乏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激励，不可避免地出现其他问题，例如，供给短缺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成立是有条件的。随着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资本有机构成出现第二部类高于第一部类等情况时，通过数学可以证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已不能满足社会再生产条件^④。从实践层面看，李翀研究发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适用于工业化早期的苏联和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的美国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日本，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适用于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不适用于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这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考虑的经济安全问题。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② 郭冠清：《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

④ 证明过程比较复杂，这里略去。

三、经济安全治理理念标识性概念的演进逻辑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安全也无从谈起，安全是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离开安全谈发展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由于每个时代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在处理经济和安全问题时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梳理经济安全治理理念的演进逻辑，对构建经济安全治理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统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统筹经济与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专列“经济问题”一节，指出“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处境非常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①。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批判只忙于革命和战争，忽略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在1933年8月12-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②他论述了经济建设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即革命是中心，经济建设是手段。由此可知，“统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安全治理理念的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选择。但当时的中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之中，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防建设、军工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在此情况下，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开启了包括国防工业、军工业在内的工业化道路，并在“一五”时期初步搭建了以156个项目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③，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这一时期经济安全治理理念形成的标志是《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专门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④，有“更多的飞机、大炮甚至是原子弹，就当时而言不是增加军政费用，而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多的进步’”^⑤。

1958年，我国走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⑥。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开启国防工业、军工业等重要工业从沿海等向内陆转移的漫长道路^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这一时期国防建设的代表。

（二）从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石油冲击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在大国博弈中基本达到纳什均衡状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19页。

③ 黄志钢、郭冠清：《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④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⑥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1958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语中首次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同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外贸部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时明确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张瑞、郭冠清：《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百年探索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⑦ 1964-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投资2000多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以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等，经过长达16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建成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单位，初步建成30余个工业城市和40余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张瑞、郭冠清：《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百年探索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态,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①。顺应时代变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我国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重要原因在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科学决策,即用标识性概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关键。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改革是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③,明确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④。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论证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⑤“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⑥,但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而不是革命,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⑦，“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⑧,强调“一心一意搞建设”^⑨“发展才是硬道理”^⑩。同时,发展以安全为前提,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和发展将建立在海市蜃楼上,这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稳定压倒一切”^⑪的原因,即使出现苏东剧变,我国依然保持波澜不惊的稳定局面。

江泽民同志对标识性概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出系统阐述。1994年5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央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就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二十字是指导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全局工作和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方针;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⑫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为题论述了十二对关系,其中,第一对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⑬。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回顾了13年取得成就的基本经验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其中之一,江泽民同志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⑭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⑮

(三) 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到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的安全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设立统筹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适应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对体制机制的需要^⑯。

① 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1972年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有关。从我国对外贸易看,1972年后变化较大。1973-1976年,我国进出口大幅增长,年均高达18.2%。其中,1973年我国进口总额增长率高达50.1%。张瑞、郭冠清:《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百年探索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③④⑤⑥⑧⑨⑩⑪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237、113、237、116、9、377、337页。

⑦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⑫⑬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68、460-475页。

⑭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4页。

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⑯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国家安全观”,开启以国家安全理念为引领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论述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①2014年11月28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与国内国际大局相关联,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②2015年5月,就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开展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安全发展理念^③。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国家安全格局与国际大局势的变化相联系,指出“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④。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⑤。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安全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将“统筹发展与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纳入必须遵循的原则,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转变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与统筹“两个大

局”的密切联系,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⑦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列为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成就和经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标题,设立国家安全专章,揭示“两个大局”之下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⑧

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不断推进经济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四、增强发展安全性的主动权,推进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

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1页。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④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⑤ 《十九届中央国安委首会,习近平压实责任》,http://news.cnr.cn/native/gd/20180418/t20180418_524203640.shtml。

⑥ 郭冠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及其学理基础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⑦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发展力、持续力。增强发展安全性的主动权，提高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新的发展阶段重中之重的事情^①。

（一）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经济为基础，政治高于经济，通过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进行统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发展理念之间的有机联系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包括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大报告列举了新时代1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贯彻新发展理念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列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安全、怎样实现安全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两者融合汇聚，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承“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构建集多方面安全于一体的整体性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有机整体的构建观，具有全局性视野，强调大安全理念。新发展理念秉承“革故鼎新、以人为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对发展具有全局性视野，强调综合全面的发展。两者的结合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大全局大整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了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新发展理念以人民至上为宗旨，两者具有共同的宗旨，都强调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的应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理念的交汇融合即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③。在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在五大发展理念中贯彻安全发展的理念，即五大发展理念都要从安全的角度进行理解。“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

要”^④，创新发展在安全发展的要求下强调重大科技的自主创新，即使是引进的技术，也要求安全可控。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上，任由差距拉大会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新形势下，要从安全角度看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绿色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绿色科技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使我国在低碳经济及相关科技上占领先机，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绿色发展能相应降低对国外油气资源的依赖，更好地保障能源安全。开放发展要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主动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成为维护中国安全发展的要求，开放发展着力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具有明确的安全发展的着眼点。共享发展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从安全角度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收入差距过大使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容易陷入社会动荡，并且“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⑤，共享发展不仅事关经济安全，而且事关政治安全。新形势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是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整体，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道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理念。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在统一，为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行动指南，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反映了上层建筑的能动性。

总体而言，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增强发展安全性主动权的基础和前提，是构建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行动指南。

（二）健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宏观经济治理水平反映一国对经济安全的把控能力。健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举，而且是应对外部冲击，破解当下各种宏观问题，增强我国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有效手段。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综合平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③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14、72、271页。

④ 《习近平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 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人民日报》，2022年6月30日。

济时期的宏观调控,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逐步形成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动态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水平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不断提高^①。以此为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②;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部署,构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的宏观治理体系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③。

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健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发展安全性的主动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④。具体而言,第一,扩大内需机制,要求“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⑤,这是保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中之重。第二,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⑥,这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长效机制。第三,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⑦。尽管在工业化后期,投资驱动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在经济安全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第四,继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

(三)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不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国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下,我国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科技实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是在集成电路技术领域,我国对集成电路需求巨大,2020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比重达16.9%^⑨。如果没有科技自立自强,统筹经济和安全将成为空中楼阁,我们步入唯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健康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要增强安全性主动权就必须突破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对于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两条重大举措^⑩:第一,科技创新,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卡脖子”技术的攻坚战;第二,突破产业瓶颈必须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全面加强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加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⑪。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第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

① 程霖、岳翔宇、夏艳秋:《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演进的视角》,《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15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⑤⑥⑦⑧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中国人大》,2023年第3期。

⑨⑩ 郭冠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及其学理基础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①，这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举。第二，实施重大发展战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②，加快自立自强步伐。第三，贯通创新的各环节，“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③，打通创新的“任督二脉”，将创新发展理念深入各环节。第四，将产业链、供应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融为一体，“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在高速铁路、特高压输电、5G网络等技术方面处于领跑地位；我国具有世界上最稀缺的超大规模市场容量资源；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中，许多领域位居中高端，这与后发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同。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国已具备突破“卡脖子”的基础条件，以系统观念为指导，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揭榜挂帅”，做好“链长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唯有如此，在可预期的未来，我国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才能实现。

（四）提高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我国经济总量上升，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引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模式已失去存在的基础。在“三驾马车”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值^④，说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以此为背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题对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这是增强经济安全性，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选择。

畅通国内大循环，提高国内循环的动力和活力，需要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供给和完整的需求体系。从制度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纳入三大基本经济制度，经过30年的发展已相对成熟，具备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⑤需要强调的是，当前市场主体活力不足，要按照“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对安全的担忧^⑥；从供给层面看，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切实解决粮食、能源、金融领域存在的安全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需求层面看，建立扩大内需机制，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完善扩大投资机制，等等。

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尽管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⑦，但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和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畅通国际循环并非易事。第一，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这一稀缺资源优势，形成内外资源联动机制。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工业体系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和微信等最便捷的支付结算方式；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最多中

①②③⑤《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中国人大》，2023年第3期。

④ 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4.48%，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高17.6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总体为负值；2009-2011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连续三年贡献率为负值；2012-2019年，贡献率分别为0.2%、-0.3%、-0.1%、0.6%、-0.8%、0.3%、-0.5%、0.7%；2020年，贡献率有所提高。

⑥ 郭冠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文明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⑦ 《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6月25日。

等收入群体、最多市场主体的国家。第二，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①，进一步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②，进一步建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第三，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0年，中欧列车达到1.24万列^④；我国先后签署或建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等14个新自由贸易区^⑤。第四，构建

内引外联的开放体系。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内外联动开放新格局。第五，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⑥。

增加经济安全性的主动权，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是严峻挑战，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推进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

Generation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conomic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GUO Guan-qing^{1, 2}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Economic security is the basis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re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eople-first valu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thought and method. The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under open conditions, the paper studies the theory and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analyzes why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why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independent production” and why to “improv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economic growth”.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ecurity governance is traced from four historical stages, that is, from th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to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n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inally, it analyzes how to enhance the initiative of securit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ly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mproving the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improving the power and vital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ircula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Scientific Thought Method ;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Relation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reliance ;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Development Security

[责任编辑:曹晶晶]

[责任校对:王文秋]

① 2019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高达1412.3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达1369.1亿美元。

② 截至2020年9月,历经5次扩容,我国已建成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③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中国人大》,2023年第3期。

④⑤ 王跃生、边恩民、张羽飞:《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三次浪潮及其演进逻辑——兼论RCEP、CECAI、CPTPP的特征和影响》,《改革》,2021年第5期。